

# 基于西北联大档案的 几个历史疑点澄清(完)

文/姚远 王展志 樊亚萍 伍小东

## 四、一分为五后的再联合

### (一)西工、西农、西大、西医的再联合

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是第一批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并独立的两个学院,时在1938年7月21日。消息传出,工学院先有拟乘机恢复“北洋”之议,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师生亦觉复校无望,亦起维持现状之议。为此,徐诵明、潘承孝等59人《为农工两院教授聘书如不续送恐各教授他往语示》致电教育部,表示反对。西北联大农学院全体学生亦于1938年7月27日联名呈件《呈请维护西北联合大学组织完整,恳请诸公同心协力据理力争》。1938年12月15日,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报告了1938年8月至11月底的筹备工作,表明接收重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

1936年9月开始的西北农专与北平研究院的合作,延续至西北联大和西北农学院成立之后。其中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金树章、刘汝强、林镕、汪德耀先后在西北联大文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复转西农任教。刘慎谔、孔宪武等被聘为西农教授,既为调查所的研究员,又为西农兼课,后来孔宪武又被聘为西北师院教授,长期留在了大西北。加上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黄文弼、何士骥等人留在西北联大文理学院历史系,这在某些程度上维持了与北平研究院的联系,

弥补了该院最终未能成为西北联大一部分的缺憾。

对于工农两院的分出,教育部的解释很明确:一是工、农两院的分立,是“调整国立各院校系计划和抗战建国纲领”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谋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设置之合理”和“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二是“农工两院设备简陋,不易发展,令与附近院校合并改组成独立学院,使人力物力集中办理”,使其更为充实;三是关于战后复校问题,“至北平收复后如有设立两院必要时,仍得照旧设置,此时不勿庸过虑”。当然,战后的实际情况是,教育部关于“仍采维持”“仍得照旧设置”的承诺并未兑现,北平大学的工、农两院以至全部北平大学并未复校,这是后话。但是,这显然已经从国家层面拉开了“致力于发展西北教育既定方针”和“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的帷幕。

1939年8月8日,西大、西师、西医最后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1946年8月西医复并入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1949年,陕西省师专、师专南郑分校、商专、医专等又并入西大,实现了新的联合。

### (二)同出一源三校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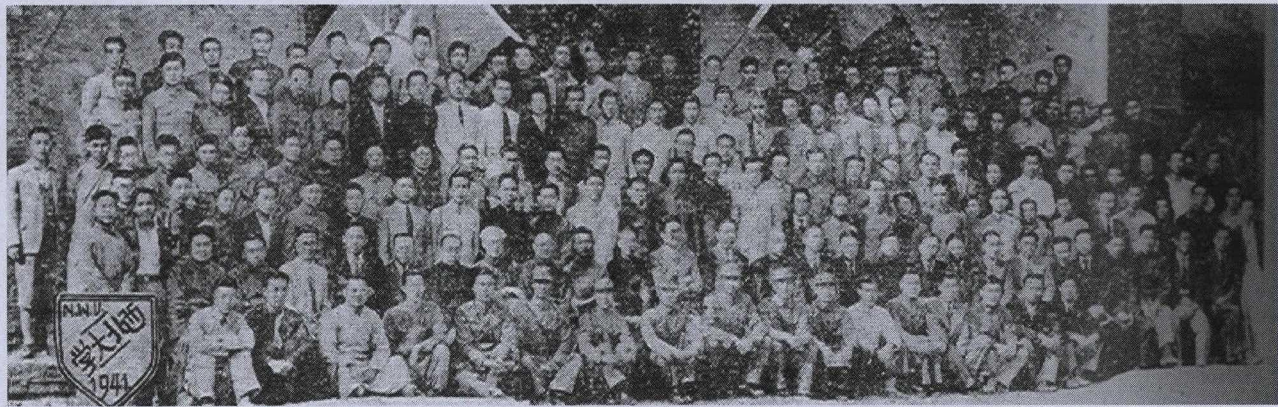
“西大”的“公诚勤朴”,“西工”的“公诚勇毅”和“西农”的“勇毅勤朴”的校训,同出一源——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

西大直接继承了西北联大的校训。2002年1月25日,西北大学百年校庆

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确定:沿用1938年10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45次会议提出的“公诚勤朴”校训为西北大学校训。“公”,即公正,公平,无私,天下为公;“诚”,即真心实意,心口相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勤”,即劳,出力,取必以渐,勤则得多;“朴”,敦厚、质朴,原始的自然质朴的存在即“道”。西北大学前校长方光华的简要解释是:“公”,即“天下为公”;“诚”,即“不诚无物”;“勤”,即“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蒋介石以“椽朴多材”四字为“西大”第一至六届毕业同学的6次重复题词、居正以“菁莪椽朴,邦国之桢”为“西大”第一届毕业同学的题词,以及陈立夫以“学问在于济世,勤俭乃能服务”为“西大”第一届毕业同学的题词,也反映了对于“朴”“勤”的理解。黎锦熙在释解西北大学校训时指出:“‘公诚勤朴’校风之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惟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

公字楼、诚字楼、勇字楼、毅字楼,在今西北联大后继院校之一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内,四座颇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端庄典雅,时刻提醒着师生铭记“公诚勇毅”校训。“公”,即公为天下、报效祖国;“诚”,即诚实守信、襟怀坦荡;“勇”,即勇

国立西北大学 1941 年毕业同学合影



猛精进、敢为人先；“毅”，即毅然果决、坚韧不拔。“公诚”定为人处世准则，“勇毅”明探求真理精神。国立西北工学院的院训“公诚勇毅”确立于 1939 年，成为师生在抗日烽火中严谨求知、教育报国的精神支柱。这与之后西北工业大学在长期办学中形成的“热爱祖国、顾全大局、艰苦创业、献身航空”的西迁精神、“一中二主三严”（“以教学为中心”“以学员为主、以教师为主”“严谨严密严格”）的办学理念，以及“三实一新”（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开拓创新）校风，一脉相承，积淀了丰富的内涵。

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训“勤朴勇毅”，同样源于西北联大的后继院校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校训。1938 年 11 月 11 日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勤朴勇毅”为校训，但经当时的教育部审核，最终确定为“诚朴勇毅”。

以“诚”字起首并以为之核心，又结合学校“农”的特色，同时有追求科学、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勇往直前的精神。“诚”：诚者，信也，真实无妄之谓，为人处世，须以诚为本；“朴”：朴者，质也，少私厚道之谓，博学经世，须以朴修身；“勇”：勇者，气也，刚心锐志之谓，创新创业，须以勇求进；“毅”：毅者，力也，不达不止之谓，任重道远，须以毅建功。“诚朴勇毅”四字校训，集中反映了西农师生践行“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办学理念，立志为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全力奉献的精神风貌。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家、被毛泽东

称赞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辛树帜教授，被毛泽东称赞“用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的著名小麦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赵洪璋教授，以及被昆虫学界誉为“蝶神”的著名昆虫分类学家周尧教授被誉为践行西农校训的化身。

### （三）联大改组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仍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预算户名

1939 年年底，一分为五后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预算，仍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户名调整扩充。

#### 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西北联大预算的训令（节选）

（国民政府行政院字 13582 号）

令发廿八年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后调整预算书，仰知照。

令教育部  
案奉

国民政府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渝字第五九五号训令开：

“为令飭事，据本府主计处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渝岁字第四二六号呈称，案准行政院吕字第一一五三一号函开，查前据教育部呈拟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即行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废除委员制，采用校长制，并将原有之医学院与师范学院一并独立设置，分别改组为国立西北医学院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改组以后之国立西北大学及国立西北医学院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之经费，仍就二十八年原列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经费概算数

调整扩充，不另增加国库负担。

… …

查教育部编造二十八年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后调整预算书内所列调整预算数计为（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四十九万一千零九元二角八分；（二）国立西北大学十一万五千零五十四元七角二分；（三）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八万元；（四）国立西北医学院五万元，合计七十三万五千一百六十四元。

… …

院长 孔祥熙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月廿六日

在 1940 年 7 月，国民政府文件中，仍可常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等三校”的称谓，以及预算中“二十八年度联大原额七十三万五千一百六十四元少六千元”“追加国立西北医学院经费六千元”的合分痕迹。

### （四）西工、西大在两年间共有一位校长

西工与西大等西北五校关系极为紧密，一度甚至两校共有一个人校长。赖琏于 1939 年 3 月任国立西北工学院代院长。1942 年 10 月 31 日起又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至 1944 年 8 月 1 日卸任。直到 1943 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后，教育部始准予他辞去院长兼职。

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赖琏的任命

令知 国府明令任命赖琏为国立西北

大学校长。

令教育部

准国民政府文官处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渝文字第五四三五号公函开：

“准铨叙部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简字第三〇号通知书，为拟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业经审查合格，实授核叙简任一級俸六百八十元，请转陈任命等由，当经转陈奉国民政府十月二十一日明令开：”任命赖琏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此令“等因在案，除由俯公布及填发任状外，相应录案函达查照并转饬知照。”等由，准此，合行令仰知照，此令。

院长 蒋中正

中华民国卅一年十月卅一日发

赖琏在 1969 年将兼掌两校的这段经历，记述为“一个最愉快的回忆”。这说明，在教育部看来，虽然联大已经分立，但仍由很多共同点，仍有很多联系，以致可由一位校长执掌两所大学。

#### (五)西大与西师合聘教授，共用校舍与设备

1939 年 8 月，西大与西师虽已分为两校，但由于学科专业相似，皆有综合性大学的某些特性，故自迁城固以后，即长期合聘教授，所见合聘教授表就有黎锦熙、谭戒甫、叶意贤、张舜琴、陆懋德、蒋百幻、蓝文征、许兴凯、刘拓、赵进义、刘亦珩、张德馨、杨立奎、蔡钟瀛、张贻侗、朱有宣、谌亚达、马师儒、唐得源、曹配言、金保赤、曹鳌、卢宗濩、傅种孙、邹豹君、李问渠、王镜铭、何竹淇、顾学颜、赵兰庭、姜玉鼎等 42 名教授、副教授与助教。

除此以外，还互相兼课、共用教室、共用宿舍、共用图书馆，甚至西大、西师与西医三校共用一辆小轿车等紧密的合作办学历史。1942 年至 1944 年陆续迁往兰州后，又在教育部支持下将城固的全部校舍赠予西大。

李仪祉(1882-1938)的聘任也表明后继院校间的密切联系。李仪祉是联系

“西大”“西农”“西工”和“东工”等联大后继院校的一个重要人物。与“西大”的关系，李仪祉创办的三所学校均与“西大”有关：一是 1912 年创办的三秦公学留德预备班，于 1914 年并入陕西西北大学；二是 1922 年在水利道路技术传习所基础上创办的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并为陕西国立西北大学工科，并任工科教授兼主任，成为“西大”乃至整个西北第一个工科，1925 年 5 月至 1927 年复任陕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三是 1932 年，“西大”前身西安中山大学改为西安高中，李仪祉于西安高中附设水利工程专科预备班，将陕西“西大”的高校身份延续到 1935 年该班并为“西农”水利组为止。

与“西农”前身“农专”的关系，即 1934 年，将西安高中附设水利工程专科预备班并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为该校水利系的创始，李仪祉兼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讲座教授。

与“西工”的关系，李仪祉于西安临大创设之初，即相继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他除在 1937 年临大工学院(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大礼堂)做《抗战力量》的演讲之外，土木工程系课表中第二学期的“最小二乘方”必修课，估计即为其所开。在 1938 年 3 月 7 日他去世前一天的“国立西安

临时大学授课时间表”中，周四下午 4:00-4:50 和 5:00-5:50，还排有他的“水工学”课。1938 年 5 月 9 日，西安临大常委会还致函李仪祉家属李赋林(陕西水利局)到校领取其代课车马费，并加送车马费，两项共计 250 元，经家属同意设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水利工程教授李仪祉先生纪念基金”，“转款存储中央银行南郑办事处，年息八厘，每年利息贰拾元，作为奖励水利工程最优毕业论文之用”。

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关系，张学良致李仪祉信，感谢为东北大学工学院“却酬讲学”，表明李仪祉在为西安临大工学院兼课的同时也为东北大学工学院兼课。

#### (六)西大、西工、西农三校联席会议

针对面临的物价上涨、再次迁校等共同问题，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不仅屡次采取共同对策，联名向行政院、监察院、教育部等机构反映面临的严重生活困难，而且于 1948 年 5 月 5 日建立了“国立西北三校院行政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的参会者为“三校院长及教务、训导、总务三处长；推定西工郝主任圣符为本会秘书；两周开会一次，由三校院轮流召集之”。

联席会议先后举行了 22 次，讨论了毕业生公费总发放办法、毕业生救济金



1940年国立西北大学足球队锦标队合影

管理办法、凡经传讯学生的学籍处理办法、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加课钟点费发放办法、就中央银行透支款利率联合呈报教育部减息、教职员薪俸补发办法、三校院呈教育部按实际物价增加办学经费、学生公费和员工薪津、国立西北四校馆在京存书运回(推测还有西师和陕西省图书馆)、在西安商议三校院派员赴川南勘察校址、三校院分别组织迁校委员会和在成都成立“国立西北三校院联合办事处”、呈请教育部速拨迁校经费、推西大赵进义、西工王健庵、西农虞宏正各为勘察校址首席委员等问题。

“国立西北三校院行政联席会议”制度在杨钟健校长等的主持下,三校院密切配合,一边呈请拨发迁校经费,一边派人赴川勘察,一边给学生放假,有效地拖延和阻止了又一次迁校。其中,特别是在成都成立“国立西北三校院联合办事处”等拟议,隐约可见一个新的西北联大呼之欲出。

(七)国立西北大学奉教育部令于1945年、1946年分两批为220名临大-联大毕业生补发毕业证,表明教育部对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关系的认可

这些学生如曹国政,“北平私立辅仁大学文学院西洋语言文学系肄业两年后借读于西安临大外文系,旋临大迁移城固,校名改为西北联大,生亦经过考试而正式转入联大于廿八年六月廿一日考试及格领得胡庶华、徐诵明及李蒸三位常务委员之毕业证明书。迄今六七年矣,但正式证书尚未领得”。在曹国政致函教育部后,教育部长朱家骅训令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补发曹国政等的毕业证。

1946年由西北联大后继院校国立西北大学补发1937年度、1938年度西北联大借读生、转学生60人,1947年补发1939年度、1940年度西北联大毕业生160人。总计220人的毕业证,均有西北联大四常委签名、联大文理学院

院长刘拓签章、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西北大学印和教育部核检章。这表明,教育部认可了国立西北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间的继承关系。

(八)西北联大最后一次分化过后两年,便有恢复大学联合体模式的呼声

《西北晨钟》1941年2卷1期发表董恩的《西北大学与西北各独立学院有合并的必要》一文。主要从“集中人力”“集中财力”“集中物力”,以及文理工农医大学同处可互相借鉴、互通有无,促使文理融合等方面的理由,提出“西北大学与西北各独立学院有合并的必要”。兹择其要点如下:

西北大学与西北各独立学院皆战时的产物,因教育部本着抗战期中集中财力物力起见,而使从战区迁移到后方的大学实行合并,其目的善矣。

如果各院校合并而为一,那么认识同学集会增多,将来在社会上各种人材皆有,做起事来亦较方便,这不是对于建设西北有莫大的利益吗?总之,西北各院校合并有利无弊,关于利的方面,实在太多,不仅上述而已。

要想达到永久的基础起见,则只有把学校迁到关中沿着陇海铁路而设立。武功为陇海铁路必经之地,当宝鸡至西安中心点,为农学院校址所在。把学校合并后,建设于此,再好也没有。那时,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大学城,此在德国即盛行。

客岁西北政务视察团来西北考察,该团由教育部陈部长率领,历经陕甘宁青诸省,对于西北各大学现状,及西北地理环境、交通、文化、建设各方面,当深切明了,西北各院校是否应该独立而分散,抑应该合并而集中,对于今后西北建设效力大小,当有更确切的指示,以不负设立西北各院校的目的。

从“脱稿于渭水河水文站”以及文中多涉西农的语气来看,这可能是西北农学院毕业学子的一个建议。当然,其

所言无谬,合分皆有利弊,自不待言,合久必多见合之弊,分久必多见分之弊。这位先生的建议肯定代表了受尽奔波之苦求学的相当一批学子的心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逝去的“西北联大”这种大学联合体的怀念。

其实,刚刚得知西北联大要再次分立的时,来自于四校的西北联大师生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模式,特别是可以继续获得北平大学等原校毕业证的做法,给人的感觉是,北平大学等校虽然戴了一顶同样的联大的“帽子”,但各自的母校仍在运行。这无论是北洋的李书田、平大的徐诵明、平师的李蒸、女师的齐璧亭,皆有此心。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为《国立北平大学一九三九年毕业同学纪念册》所作的序中,即有:“光复河山,重返北平,不失旧物,此心未尝一日忘也”的说法。

因此,当联大要在继工农两院独立设置后再一次最后分立时,立刻在校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首先发难的是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1938年7月27日,西北联大农学院即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全体学生联名呈件:《呈请维护西北联合大学组织完整,恳请诸公同心协力据理力争》:

自本大学成立以来,设教西北启发边陲,当此之时,使命甚重,此所以最高国防会议将本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以重其使命而健其组织也,考其意义盖欲西北之各独立学院各专科学校次第并入本大学,集中人力财力以共负其使命耳,今教育部电令本大学农学院与武功农专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显系与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案之意旨相左,此应据理力争者一;按国防方针、名流意向、高等教育之实施率以综合大学为依归,良以节省经费便于教学,我国实施以来颇著成效,兹教育部所命显有背于国防方针失检于实际效果,此应据理力争者二;西北联合大学乃平津三校院合

组而成，现虽平津失陷，然吾校尚存西北，而能于最高领袖领导之下其意义之深何可言喻，况来此者翘仕平津更坚定抗战之志，滞平津者系念吾校常怀南下之心，故西北联大之高最高国防会议亦谆谆言其使命也，且以三校历史彪炳全国，当如何获其存在，今而若是实有失于抗战之意，此应据理力争者三。我西北联合大学既经联合当为一体，微理任当共负之，联大之荣即三校之荣，联大之辱即三校之辱，昔既联合而负其使命，今背其联合是则联大之蠢，此所以愿诸公同心协力者一。我三校按校址之处在以往历史之光荣以及其在我国所负使命，……大类皆仿佛……之复宜如何图其共存共荣而希于抗战胜利之后重回故土乎。唇齿之意虞果之迹诸公明哲何待言，此所以愿诸公同心协力者二。

从其中“我西北联合大学既经联合当为一体”，“联大之荣即三校之荣，联大之辱即三校之辱，昔既联合而负其使命，今背其联合是则联大之蠢”等强烈语气来看，“西北联大”之称确已为大家所认可，的确已经深入人心。这也可能正是西北联大之所以至今仍然被人们关注、被人们怀念的原因所在。

## 五、结论

合亦是分，分亦是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分分合合本无常。1938年7月，正当全面抗战爆发周年之际，国民政府重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促使立足未稳、餐舍稍安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诞生了两个最早的子体——工、农两院，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分合合；以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工科独立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名义（另一所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实现了华北、东北、中原的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的新一轮联合；以当时国内唯一的独立农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名义，实现了西北、华北、中原的



南迁城固时期学生社团自励社部分成员合影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2年12月归并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和1934年9月归并陕西省水利专科）、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河南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新一轮联合。这不仅成为“国立西北五校”架构的先声，而且同时形成了我国战时最强大的综合性工程技术和综合性农业技术的两所独立学院。

国立西北大学作为民国时期西北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继承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大综合性的衣钵，一度名列民国十大著名学府，在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高等教育母机”作用。

民国年间，西北地区盼望创设大学的愿望日益高涨，尤其是随着开发西北重心的西移，甘肃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尤其强烈，陕甘间在1923年、1936年曾两次争办西北大学，直至国民党五中全会、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均做出了有利于甘省的决议，后因预算未能通过而流产。这为稍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国立西北医学院并入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设立兰州分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协助创建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国立畜牧兽医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拟设平凉或天水，以及国立西北大学有意在乌鲁木齐设立分校等谋划奠定了民意

基础。同时，这些意见为将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工、农、医、师分别独立设置和在陕甘的展布作了重要的舆论铺垫，也因应了陕甘宁青新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渴望兴办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其中，尤其是西师迁兰，意味着发源于晚清北京的我国最早的师范高等教育由平津向西推进了1000公里，至西北的东大门西安，再由西安向南翻越秦岭推进250公里至与成都平原接壤的汉中盆地，再以其传承者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兰，一路向西，将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再向西推进了1000公里，直抵邻近新疆的敦煌，真正实现了在陕甘展布高等教育的初衷，也一举扭转了中国高等教育重床迭屋的畸形分布。西师实际上肩负了厚植西北基础教育、培植中等教育师资及广开社会教育的重大使命。当然，西医最终落地西安，也将我国发源于北京的最早国立西医高等教育传承光大，从而奠定了西北区域医疗中心的地位，开拓了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新纪元。（全文完）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省档案局、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渭河热电厂）